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ZHONGGUO JINDAI WENHUA TANSUO

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龚书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龚书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文化探索/龚书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2099-4

I. ①中… II. ①龚…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40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2.5

字数: 337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韩凌燕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序

我国史学关于文化史的论述，有很老的历史。大致可信为先秦人所作的古籍，如《世本》，记事物原始；《山海经》，详神话传说；《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评论当时的主要学派，都是关于文化史的论述。《易》、《书》、《诗》、《春秋》三传，也都有关于文化史的材料。司马迁作《史记》，规模恢廓；所著八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都是关于文化史的专篇；《河渠书》和《平准书》，也都跟文化史有密切关系；所著列传七十，其中诸子、词赋、医药、卜筮等人的传记占了很大的分量。其后的纪传体史书，除有关专家的传记外，一般多有《儒林传》和《文苑传》。萧统的《文选》，精选各体名作，分门别类，可说是文学史的原始形式，后来历代都有诗文总集的编选。朱熹撰《伊洛渊源》，可能是学术史的首创。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是一部精心的杰构。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有一百卷。朱彝尊撰《经异考》，有三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二百卷。这几部书，也都可说是文化专史的古典形式。我们应该看到古人在文化史方面工作的成就，但跟政治史方面的工作比起来，就显得工作做得太少了。而且古人那种写当代人、记当代事的优良传统，越到后来越削弱了，甚至抛弃了。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变动接连不断，而且往往是变动得很激烈。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有的史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但总的说来，史学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古代、轻近

代，重政治、轻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扭转过来。毛泽东同志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名著里说：“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他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是毛主席在1941年说的话，距离现在已有四十六年了，大家都赞成毛主席提出的任务，但一直未能认真地进行。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显现出日趋活跃的可喜现象。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同古代文化史的研究联系起来，同东西方的影响联系起来，当然也要和政治、经济的形势发展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工作会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龚书铎同志治史垂四十年，向来注重思想文化的研究。这几年来，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潜心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探索，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传统观念的变化、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都做了宏观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着重就鸦片战争时期、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某些文化问题进行了具体剖析，涉及的文化领域也比较广泛，对思想、社会观念、社会习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诸多文化现象，也作了综合的考察与论述。现在他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将起到推动、开拓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大不易，而且这项工作尚在起步阶段。希望书铎同志在这本书出版后，继续写出第二本、第三本以至很多本来。

白寿彝

于北京

1987年12月2日

目 录

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1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12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	28
近代文化漫论	36
文化、社会与时代	47
怎样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	5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60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变化	71
近代社会习俗变化漫话	85
“全盘西化”论的历史考察	88
乾隆年间文化断想	98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	105

姚莹交游述略	119
姚莹与台湾	134
道光年间文化述论	140
黄金台的《木鸡书屋诗选》	154
太平天国史研究随想	158
甲午战争期间的社会舆论	161
翁同龢与甲午战争	176
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	187
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	194
论孙中山的文化观	206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	222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231
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述评	241
辛亥革命与戏剧	247
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封建文化专制的斗争	263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	275
“五四”时期关于戏曲的论争	281
程长庚	291
谭鑫培	295
王钟声	300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序	303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序	305
《文化“怪杰”——辜鸿铭》序	308
《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序	313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讨论》跋	315
《晚清思想史》序	317
我与中国文化史	319
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	329

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研究近代中国文化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文化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涉及我们对近代历史怎么看。文化作为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对近代历史估计不准确，那么对近代文化也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估计。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后的。近代中国确实是落后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下，日益陷于贫困落后。但中国的落后，不是近代才开始的。事实上，至少从明朝以后，尤其是清朝统治期间就已经落后了。当时的欧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迅速发展。而这时的清朝，没有发生文艺复兴，也没有爆发产业革命。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对内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闭关锁国。结下的恶果，是鸦片战争的惨败。

鸦片战争失败后，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不断追求、探索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道路。外国侵略者的大炮吓坏了清朝的皇帝和腐朽昏庸的官吏，但人民群众却前赴后继地奋起反抗，一些士大夫也在大炮声中惊醒起来，反过来向西方寻找救国的方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为使中国独立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近代历史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比起古代文化来，应该说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古代文化有辉煌的成就，但近代文化毕竟向前发展了。当然举局部的或个别的例子相比，近代文化有不如古代文化的，但从整体看，从发展趋向看，可以肯定近代文化是进步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文化相对单一。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社会，变化相当大，出现了新的因素。在近代，除原有的封建经济外，

又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①显然，近代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整个系统相对于古代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么，近代文化究竟有什么特点呢？下面所谈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准确与否，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16世纪进一步发展，17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世纪法国开展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则与此不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条件。就以思想文化的情况而言，18世纪正当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利用修《四库全书》禁毁、删改书籍；同时引导知识分子埋头于科举八股和繁琐考据，使人们严重脱离实际，思想锢蔽僵化。这种状况，与蓬勃发展的法国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又互相会通融合，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矛盾冲突。这是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学，特别是到鸦片战争之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封建的伦理纲常，讲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套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是一个系统、一个类型。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感情、观念出发，对于西方文化是难以接受的。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关于在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就引起一场大争论。大学士倭仁等守旧分子“以道学鸣高”，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师事夷人”学天文算学，认为这样一来必将“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鼓吹“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等谬论。

不仅统治阶级内部表现出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农民起义内部或与统治阶级之间也反映了这种矛盾冲突。太平天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其中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男的都是兄弟、女的都是姊妹的思想。这一思想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把君臣、父子、夫妇等尊卑贵贱秩序颠倒了。这当然与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不相容，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曾国藩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发布《讨粤匪檄》。檄文中攻击太平天国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以此来号召和吸引地主阶级中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反对太平天国，卫护封建文化。这说明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反映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当然，后来曾国藩也有变化，成为洋务派，接受了某些西方文化。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教案”，反教会斗争一直不断。外国传教士到中国设立教堂，其中有些人横行霸道，充当间谍，到处搜集情报，干预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反对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是爱国的。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同传统文化本身是不同的，例如敬孔祭祖，两者是不相容的。从文化史角度看，“教案”除具有人民反对外来教会侵略、压迫的性质外，还包含不同文化心理、感情、习惯的冲突。这里既有民间百姓，也有绅士和官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具有相同的

传统文化心理：尽量防守自己的东西，不要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传进来后，不断地出现矛盾斗争，当然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冲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

中西文化间有矛盾冲突，同时也有会通融合。这种情况贯穿整个近代，1895年中日战争后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一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曾提出这样的主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①。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②。后来，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③。

概括地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是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是毫无疑问的，所缺乏的是同英国对抗坚船利炮。后来，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到了洋务运动时，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本体，不能变动，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即技艺。用中学来包容西学，反映了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的较低层次。也可以说，这是不可避免经历的阶段。人们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西学为用”这一主张，在清朝统治者内部态度很不一样，矛盾很尖锐。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就能实现的。当时人们认为传统文化体系不能动，可以学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然而没有这一阶段，也就无法向前发展。“西学为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潮流，对社会缓慢地产生影响，虽然缓慢，但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纲常，受到了冲击。所以，顽固派害怕得不得了，拼命加以反对。到甲午战争后，人们的思想又前进一步，不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文化，而是要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等。康有为要建立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王棫主编：《严复集》第3册，5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七），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君主立宪，孙中山要搞民主共和国。在这时，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变化愈来愈大。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展到一个高潮。

从个人的情况来看，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都表现出对中西文化不同程度的会通融合。孙中山曾经对其学说的建立作了概括，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选择而不盲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如此，最终是自己的创造。所以，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独见而创立的。

这里还需要谈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规模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一次是汉代以来，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一次是明末清初，来华西方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但没有传开，只在像徐光启这样少数士大夫中产生了影响。由于传教士干预清朝内政，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投入监狱。与此不同的是，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开了。但是，佛教文化同儒学文化相比最多是同层次的文化，也许比儒学还低一些，因而容易被中国文化所消融，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近代则与古代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质的文化，是不同层次的文化。当时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儒学中的汉学、宋学都无力去消融西方文化，而是败下阵来。可以说，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中，西方文化占主要成分。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说近代在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全国都是一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沿江沿海的城市，出现了中西文化的混合存在，在广大内地村镇却仍然固守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自民族传统。这种现象，在

^①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七），60页。

现在一些地区仍可以看到，这些地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状况要改变，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事情，是长期的，需要有一个过程。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也是中国国情。不能不努力去改变，也不能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

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用四个字概括：民主、科学

“科学”这一口号是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五四”之前没有明确的口号。但自鸦片战争后，有见识的中国人都在为此探索追求。

关于科学，鸦片战争后，有眼光的人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来又认识到还要学习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甲午战争后，从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提出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直至主张学习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五四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做了长时期的准备。

民主方面，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介绍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渐渐多起来。人们认为，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权偏于下，君主权偏于上，君民共主权得其中。士大夫所以称赞君民共主，反映了他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勇气去抛弃君主。1895年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维新运动，要改变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从事实际的改革，虽然失败了，却是近代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环节。由于维新思想家的宣传，民权思想在知识界中有着重大影响。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是民权平等，同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不相容。张之洞就竭力反对民权说，他在《劝学篇》中鼓吹“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从反面可以看出，民权思想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冲击。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不要皇帝了，比康梁更彻底。正因为民主思想的传播、发展，才有“五四”时期“民主”口号的提出。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思想启蒙、对封建文化的涤荡，如果还像鸦片战争前那样愚顽，那么也不会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对我

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口号，在现实社会中封建残余还不少。

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被动的，不像西方文化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之时，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在外国的挑战下被迫应战的。所以是学习西方又用来反对西方侵略者，即魏源的名言“师夷制夷”。封建统治者抱着“天朝上国”的观念，原来是很看不起“夷人”的，以为“夷人”没有礼义纲常，如禽兽一般。时至19世纪70年代，还有个士大夫叫李元度的，异想天开地说：现在交通方便，把世界的距离缩短了，这正是利用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向西方输送圣道的好机会，以拯救西方，使他们免沦为禽兽。李元度还是固守“用夏变夷”那一套愚顽陈腐的观念。与此相反，有见识的中国人则是要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救国的东西，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甲午战争清政府败于日本，引起了中国社会很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是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维新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既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这次文化革新，从政治、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风俗习惯等，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单就文艺说，就有“诗界革命”、“散文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文化革新运动是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为这一政治运动服务。维新家们就是通过新文化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以唤醒国人振衰起弱。此后，文化就沿着这个轨道发展下去。辛亥革命时期的“陶铸国魂”，后来的“改造国民性”，都是革命的需要，为了改变中国的积弱落后局面。

还可以举诗歌为例，来具体说明。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寰海》诗，对清朝统治的腐败、英军对华侵略，深表愤慨。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首倡者之一，他的诗集《人境庐诗草》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女革命家、诗人秋瑾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